

# 发现理论还是验证理论

## ——现代科学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困境及出路<sup>\*</sup>

邓曦泽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越能生产有效知识的学科越重要、越繁荣。在古代,历史学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大量记录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丰富样本;二是使用归纳法对样本进行归纳,发现一些规律。这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归纳的知识生产方式,具有进行有效理论建构的功能,并成为古代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由此导致历史学颇为繁荣。但是,现代科学诞生以来,它以更强大的知识生产功能使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相形见绌,历史学也因此沦为验证现成理论的案例和注脚,价值日益降低。而未来的历史学要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焕发生产知识、发现理论的生命力,除了要把历史学改进为问题式历史研究,把文献史改进

为问题史之外,还需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使之接近现代科学。

[关键词] 历史研究 发现 验证 理论 现代科学

[作者简介] 邓曦泽(1973—),男,四川省泸县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3)04-0140-08

晚近以来,与方兴未艾的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新兴、实用的学科相比,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明显衰微了。历史学为什么会衰微?它又如何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历史学之所以衰微,是因为古代没有现代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而历史学基于大量事件而进行归纳,具有生产知识、发现理论的重要功能,因而成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方式。但是,现代科学以其更强大的知识生产功能,使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相形见绌,而历史学就沦为验证理论的案例和注脚,价值日益降低。历史学要想重新获得生命力,除了把历史学改进为问题式历史研究,把文献史改进为问题史,还应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从而使之接近现代科学。

<sup>\*</sup> 笔者的博士论文对《左传》所记战争与会盟作了完全统计(《春秋左传战争表》、《春秋左传会盟表》及《春秋战争战争考》)。以此统计为基础,笔者已完成《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一书的初稿。本文属此书导论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此方法论讨论,是因为书稿亦属历史研究(政治史研究),而笔者试图摆脱沦为验证理论的常规历史研究。倘要摆脱常规,仅从史料上下功夫是不够的,还需要并首先需要在方法上独辟蹊径。晚近以来历史研究的式微,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兴盛使历史研究生产知识、发现理论的功能相形见绌。是故,历史研究应当反省自身,进行自我批判,才能发展自身。历史研究只有放在问题之下并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是放在现成理论之下或停留于训诂考据,才能走出困境,重新发现有效理论,焕发生产知识的生产力。此文所论方法论,适用于一切文本研究,历史研究与文本研究其实是一回事。

## 一、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

人类必须进行生产,才能生存、繁衍和发展。在人类之初,知识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基本上是糅合在一起的。人类已发现的在没有文字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远古遗存,其生产的分工程度很低,尤其是没有将知识生产和物质生产分离,知识生产包含于物质生产,因为那个时候尚不具备将知识生产从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的重要且必要的条件——文字。而结绳记事,口耳相传是非常初级的知识传播和积累方式,无法摆脱传授的时间、空间限制及辗转传授所产生的理解、表达和传播歧义,因而无法为知识独立生产提供有效手段。

文字是知识独立生产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字是知识独立生产的充分条件。要使知识得以独立生产,还需一个必要条件——制度条件。制度条件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允许少部分人专门从事知识生产,成为专业学者,为他们提供生活条件和生产知识所需的学术条件。中国很早就有了这样的专业学者,如上古的卜、巫、祝、史,而史官尤其具有专业学者的特征。《汉书·艺文志》讲“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等等,这些“官”既是职官也是专业学者,他们不但承担相关事务的处理工作,同时也对相关事务进行理论总结和建构,而后者就是专业学者的职能。到了西周,学者的专业化更明显,形成了六艺之学,也形成了大量的典籍。到了战国,诸侯养士成风,这些士中,有不少就是专业学者(即余英时所言的“文化事务专家”<sup>①</sup>)。齐国的稷下学宫中,就有不少专业学者。并且,战国时期,还增设了博士。此博士虽是官名,但并非行政职官,而是学术职官。秦朝,博士不少,“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sup>②</sup>。秦汉以后,学者的专业化就更明显了。而隋唐确立科举制后,学者的专业化被明确地制度化,专业学者和官员一样,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国家的资助和支持。

对于人类知识生产来说,学者的专业化极其重要,它使知识的生产、传播和积累变得永续,尤其是推动了有效知识的生产速度。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领先于世界,与学者的专业化亦即知识生产、传播和积累的专业化密切相关。世界几个主要文明都很早就有了专业学者,如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

阿拉伯文明。

知识产生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或生产活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生活中,任何人生下来后,首先进行的活动是学习(广义),在对知识(广义)掌握到一定程度后,他才运用知识去生产。知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被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如果行为者没有一定的有效知识作指导,不论这些知识是在教育中获得的还是自己独创的,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那么,行为者的活动将与动物无异。行为者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计划性。

生产知识也就是生产行为者的计划性。只有在行为者的知识所支配的计划之下,行为者采取行动(即去生产),对象才能被改变,成为特定的呈现样态,也就是行为者所期望的目的世界(虽然经常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可以逐步修正)。因此,知识被生产,决定用知识去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活动。

## 二、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经验归纳的知识生产方式

生产知识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活动,而学者的专业化满足了知识的永续生产、传播和积累的重要条件(近乎充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生产一定以某种形式(如某个问题、某种研究方法、某个学科)进行,更不意味着有效知识的生产速度有多快。

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历史研究(史学)是一种很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它以归纳法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通过大量记录各种事件,尽可能从事件中发现一般性、规律性的东西,建立相应的理论,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在和未来,指导人们的行动,此即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③</sup>“旧闻”是历史事件,是样本;“理”,是规律;“稽”,是获得规律的方法,而司马迁之“稽”,即归纳法。归纳法的哲

①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汉书·司马迁传》。

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所以,历史研究发现理论的根据也是经验主义。同时,经验主义是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之一,有不少科学发现都是通过经验归纳,再加上数理手段,形成规范理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与科学具有一定的交集,它通过经验归纳(不完全归纳法),发现一些不完全可靠的规律,建立相应的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事件和预测未来。

历史学能够进行理论建构,这本身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根据历史学的基本特征(更准确地说,是其方法特征)推论出来的。历史学的方法有二:其一,大量记录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丰富的样本;其二,归纳法,对样本进行归纳。基于这两个方法,可以推论出历史学具有进行有效理论建构的功能,即历史学通过对样本进行归纳,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可靠的规律。根据这两个方法还可知道,历史学并无确定的研究对象,许多对象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意味着,历史学可以归纳、总结关于许多对象的知识。

在古代学术中,对于有效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历史学居于首要地位。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人类尚不会使用数学来描述实验和经验事件,而先验主义根本无法生产有效知识,所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就成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方式。比较起来,虽然其他某些专业化学科也偶尔记录事件,并偶尔运用归纳法,但由于历史学对事件的记录数量(样本量)和对归纳法的运用程度,都高于其他学科,所以,历史学生产知识和有效知识的能力都高于其他学科。当然,由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很宽泛,所以,有不少零散的研究和经验,虽然没有冠以历史学之名,但实际上都可以归入历史学。换言之,说历史学是古代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实际上是说,通过收集样本而进行归纳,是古代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可以概括为“问题+历史材料+经验归纳”的研究范式。

就专业史学来看,中国的历史学也许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第一,对历史学有明确的目的期待,这一目的可以概括为以史为鉴。第二,对历史学的功能有明确认识,其功能的经典表达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关于历史学的目的和功能,司马光在《进书(《资治通鉴》)表》中有较详备的表达:“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

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粗精不杂……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sup>①</sup>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是:国家兴衰的规律是什么?基本方法是:收集大量历史事件(相当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调查、收集样本和数据),并以与国家兴衰的相关度为标准进行遴选(即司马光所言的“删削冗长”,这相当于现代的样本筛选);对众多历史事件进行归纳、总结,具有明确的经验特征(即司马光所言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通过归纳过去,解释当下与未来,并预测未来,这也与现代的归纳法相同)。其基本目的有二:在认知上,寻找其中具有规律性的关键信息,进行理论建构(即司马光所言的“举撮机要”,这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相同);在价值上,运用建构的理论,指导国家治理,或更一般地讲,指导人们的行为(即司马光所言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也与现代研究完全相同)。第三,制度内外对历史学都给予了大量支持。在制度内,有从事史料收集和研究的专门机构,有大量专业人员,国家给予了较大的财政支持,史官地位一直都很高。在制度外,还有大量民间史学家,民间也为历史学提供了大量资助和支持。第四,产生了大量史学著作,不但有大量官史,也有大量民间史书。第五,史学著作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记录了大量重要人物和事件(即样本丰富),得出了一些较可靠的一般性结论。但是,由于历史学的归纳方法无法得出完全可靠的必然性、普遍性结论,所以,历史学命题需要在经验中不断检验。在某段时期,人们根据某些样本可以得出结论A,但是,如果人们在另一段时期找到了A的明显反例,那么,结论A就应该被修正。这也符合科学的观念,“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它预期人们一定迟早会发现必须对它的目前的理论作出修正,并且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出圆满的、最终的论证的方法”<sup>②</sup>。所以,古代的历史学是较为接近科学的。

这里再以汉武帝对历史的解读(研究)为例,看看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及其自我修正。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汉武帝向董仲舒问策时,表达了自己的

① 《资治通鉴》,第9607—96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② [英]罗素:《宗教与科学》,第5页,徐奕春、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困惑(“盖闻虞舜之时……切磋商之”部分):为什么同一种治国策略,在不同时期、不同治理者那里,会产生很不相同的效果呢?治国难道没有稳定可靠的规律吗?对于汉武帝的怀疑,可以列表如下:

表1 汉武帝对以史为鉴的结构之反思

编号	问题	施行者	方法	效用
1	如何治国平天下	虞舜	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	天下太平(十分有效)
2		周文王	日昃不暇食	宇内亦治(比较有效)
3		汉武帝	夙寤晨兴	功烈休德未始云获(局部有效,成效不大)
4		殷人	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	(局部有效)
5		成、康	不式(基本不用刑罚)	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十分有效)
6		秦国	重刑罚	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基本无效)
7		汉武帝	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	未始云获(局部有效)

从此表可看出,汉武帝完全是在进行统计和归纳,试图发现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规律。如果不考虑现代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等)对数学方法的使用,汉武帝的方法与现代社会科学很相近。实际上,普通人(包括学者在某些时候)也在运用汉武帝的方法,汉武帝的统计方法和归纳方法是现代科学的基础部分,是人类广泛使用且局部有效的方法,而在古代则是最强大的方法。

关于经验主义或归纳法的弱点(亦即史学的弱点),希腊哲学家的看法可以说是对的,即经验手段无法产生普遍的、必然的结论,但是,哲学提供的解决方案(玄思)却是更糟糕的方案,因为玄思似乎能获得一些普遍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只是非常笼统的,无法针对具体事件作出解释和预测,其有效性反而低于经验(或历史学)。在没有找到更优知识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哲学对经验(或历史学)的批评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当批评者提供了优于被批评者的方案时,批评才是有效的。要指出某种方案(或理论、法律、策略等)的不足,很容易;但要提供更优的替代方案,却很难。

有没有更优的知识生产方式呢?——有,这就是现代科学。

### 三、从发现理论到验证理论: 现代科学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命运变迁

近代科学革命引发了一场巨大变化,其最大变

化在于把数学引入了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通过数学这种描述分析工具而具有了普遍性,便成为“数理科学”,即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给传统学术带来的巨大冲击、振荡和裂变<sup>①</sup>。现代科学在方法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伽利略开创的“数学+实验”(参见丹皮尔<sup>②</sup>、爱因斯坦<sup>③</sup>、罗素<sup>④</sup>的论述)。“数学+实验”这个方法组合(结构)运用在不同对象上,就产生不同的科学学科。

以“数学+实验”为基本方法的现代科学,不但超越了哲学(玄思),也超越了历史学(归纳),成为既能提供普遍结论,又能解释经验事件的知识生产方式。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科学在不断生产有效知识的同时,也迅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知识转化生产力。经过几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现代科学的威力已经无可否认,并拓展至社会领域,建立了社会科学。于是,科学攻城略地,几乎占据了所有知识生产部门,连传统学术如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神学、宗教学也不得不经常借用科学的方法。概言之,现代科学在所有知识生产部门中都占有全面和遥遥领先的优势。

那么,历史学还能做什么?历史学何去何从?

其实,就自身绝对功能来看,历史学的功能丝毫没有下降,它仍然能以不低于古代的水平生产知识。但关键在于:一个事物的价值不但由它自身的绝对价值所决定,更由它的价值与其他同类事物价值的比较状况而决定。这里的比较就是竞争。其实,对于一个事物的价值,真正重要甚至唯一的判断标准是后者,即(对于行为者)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其他同类事物价值的竞争状况。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价值乃是它的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如果A方案比B方案更能实现行为者的目标,行为者显然会选择A。如果行为者面对至少两个同类事物,那么,他一定会比较,选择更优的。如果行为者面对唯一的事物,亦即唯一的选择,则该事物的比较对象是空集,那么,他不可能有任何选

① [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第20页,傅统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 [英]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第195页,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③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④ [英]罗素:《宗教与科学》,第16页。

择、抱怨和满意(无所谓选择、抱怨和满意);那么,该事物的相对价值也就是其绝对价值。这意味着,如果存在针对同类问题(因此具有同类价值)的方案 A 与 B,行为者一定会进行比较,比较就是 A 与 B 的竞争,然后,胜出者被采用。高级的东西(产品、知识、工具、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可以让低级的东西衰落,甚至报废(这实际上就是本文的推理规则)。由此可知,历史学(以及哲学等传统学科)不是它生产知识的绝对功能下降了,而是它与现代科学相比,相对功能下降了。<sup>①</sup> 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不但报废了许多旧知识,也报废了许多旧的知识生产方式。不过,历史学只是式微,而未报废。举一个同构的例子。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帆船的绝对功能也没有下降,它在传统社会中能做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同样能做什么,但是,帆船的功能与轮船相比,相形见绌,所以,在竞争中,帆船完全不是轮船的对手。

在自然科学领域,传统历史学几乎毫无用处,除了回顾性地撰写科学史。而科学史的目的不再是生产知识、发现理论,而是整理理论,使之形成一个历史脉络,让那些喜欢历史故事的人去眷顾。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借用科学方法,日益科学化,其生产知识、发现理论的能力日益强大,也使传统历史学相形见绌。虽然历史学生产知识的绝对功能并没有下降,但是,面对远比它高级的知识生产方式——现代科学(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学所生产的知识毫无价值(价值为零),甚至是负价值。怎么理解历史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可能为负?设历史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为 X,现代科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为 Y, Y 与 X 的价值差或效用差为 Z,两者的成本相同。如果行为者能够获得现代科学的价值 Y,却只获得了历史学的价值 X,在可选择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行为者损失了价值 Z<sup>②</sup>,因此,根据“一个事物的价值乃是它的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的命题,对于行为者来说,历史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实际上是一 Z。换言之,根据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当行为者可以选择 Y 时, X 对于他来说就是不应选择的,若要选择 X,他就相当于损失了 Z,因此, X 对于他来说,价值乃是一 Z。当这样理解知识的价值时,则意味着,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是以既有知识的最高水平为标准的,凡是低于最高水平的生

产都是低水平的重复,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知识价值观有助于促进人们进行真正的创新,减少重复劳动。

这里的讨论看似很反主流,但其实与通常的史学理论有不少相通之处。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指出历史学的职能是记录和总结兴衰交替(的规律)。<sup>③</sup>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指出:“在历史中,事实已经给出,要找寻的是原则。”<sup>④</sup> 他还谈到了历史学的归纳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历史学在现代沦为验证理论。<sup>⑤</sup> 布洛赫(Marc Bloch)也明确指出以古知今的必要和可能<sup>⑥</sup>。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也指出历史中存在着老方法和新方法的变迁以及二者的协调问题<sup>⑦</sup>。但是,他们的不足在于没有明确认识到,一切学科的第一本质(即第一目的和功能)乃是生产知识,因而,他们都未曾明确指出,历史学其实是一种具体的知识生产方式,其根本任务是生产知识和有效知识;继而,他们更未明确将历史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与其他知识生产方式尤其是与现代科学这种生产方式相比较,辨析各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功能的变化和大小,从而理智、科学地认识和对待历史学。

然而,越到后来,史学理论家对现代科学的理解越深,就越看到历史研究的危机和衰微。例如,

① 根据这个道理,也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衰落。16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之衰落,不是因为它自身功能下降,而是与西方的迅速前进相比,相形见绌。

② 这个价值差作为损失,看似机会成本,实际上不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在多种方案中只选其一,被舍弃项中价值最高的选项,若 a、b、c、……、n 的价值无序排列,假定行为者选择 b,而 k 是余下项中价值最高者,则 k 是此次选择的机会成本。这里所论的价值差,不是这样的 k,而是将选项按照价值高低排序为 a、b、c、……、n,在可选择最优方案 a 的情况下,行为者却选择了较劣方案 k,从而损失了 a-k,而不是损失了剩余选项中的价值最大者 b。机会成本是不可能避免的,但这一损失却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损失,尚无法归为现有的成本分类中的任何一种成本,它很可能是人们尚未认识到的一种成本,可以称为“劣向选择成本”(Bad-oriented choice cost)或“劣向成本”(Bad-oriented cost)。这种成本可以更基础、彻底地解释竞争。

③④⑤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 232、267、27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⑥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第 34 页,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⑦ [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 445—447 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曼德尔鲍姆(Maurice H. Mandelbaum)认为“历史学家的全部目的都是描述、叙述”<sup>①</sup>,而将发现规律作为附带功能,这种定位乃是历史学在现代科学冲击下的逃遁。如果其所言为真,则历史学所提供的只不过是更真实的历史事件,亦即更真实的样本,那么,与传统历史学相比,它发现归纳性质的非必然规律的企图和功能都大大减弱了,所以,这样的历史学只能生产出低级的知识。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或译“布劳代尔”)也指出,在新知识积累(实乃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正经历着“普遍的危机”;并且,虽然文明史试图用过去解释现在和未来(与中国的鉴往知来相当),但实际上,文明史的解释功能的可靠性并不高。<sup>②</sup>亨佩尔(Carl G. Hempel)指出,历史研究要假定和总结普遍规律<sup>③</sup>。罗素则指出,历史学企图成为科学,但在现代科学背景下,它越来越不成其为科学,而成为讲故事的艺术。<sup>④</sup>布罗代尔、亨佩尔、罗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从生产知识角度理解历史研究,但还不够明确。而在中国,由于历史学者大多数是文科出身,对科学这个舶来品的理解并不深,所以,关于历史学的功能和定位还远不如西方客观、准确和深刻。

其实,经历了现代科学几百年的冲击,在与现代科学的竞争中,历史学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它在生产知识、发现理论方面的功能根本无法跟现代科学相提并论,于是,历史学几乎完全转入了整理与梳理。

但是,整理与梳理不是随意的。历史学在整理与梳理文献时,必须带有一定的理论,而这些文献被整理出来后,呈现的乃是那些理论。也就是说,文献成了理论的验证,而不是从文献中发现理论。不过,有一问题需略作考量。能否把现代以降的所有文献整理都归为验证理论?这需要在两种程度上理解:一是强的程度,二是弱的程度。在强的程度,只要文献整理不是为了发现理论,并且不是盲目的,那么,文献整理就必然是在特定理论的支配下进行,不管整理者是否意识到支配其整理工作的理论。因此,这种文献整理一定是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验证理论。例如,“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历代文论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儒家经典读本”之类的文献整理,都受了一定理论的支配,都在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验证理论。

在弱的程度,有些文献整理并不受明确的理论的支配,这大体包括叙述事件原委(在古代,则如纪事本末体)和考据。这两种情况,如果服务于发现理论,则属于提供事实,亦即发挥提供经验案例、样本的作用。不过,当样本越来越多或充分时,新发现的样本的价值会越来越小,甚至趋近于零。

历史研究在近代以降逐渐转向验证理论,并成为主流,梁启超、陈寅恪、吕思勉、范文澜、郭沫若、游国恩、冯友兰、牟宗三、胡适等的历史、文学史或哲学史研究均是如此(不排除有例外)。例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就以西方的平等与自由观念为理论(这些理论在这里是作为方法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献中是否有相关理论。<sup>⑤</sup>梁启超在解读文献之前,已经有了一套先行的理论,他根本不是要发现新理论,而是要通过古代文献来验证理论。“五四”之际以来林林总总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儒家民主思想”、“方以智辩证法”之类的研究,都是在用史料去验证现成理论,这些研究都是历史研究。<sup>⑥</sup>

当史料成为现成理论的验证时,历史学不再生产知识、发现理论,因而对人类知识和文明的积累就基本上不再有贡献,其价值仅仅表现在为理论提供验证案例,但这种做法的价值是很低的,且随着案例的增多,案例的边际价值越来越低。例如,如果甲用一些史料来验证了儒家具有民主思想,乙、丙、丁……也用一些史料来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越到后面的人提供的史料的验证力越低,多一案例对于“儒家具有民主思想”这一命题/理论来说,并无多少意义,也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鲜信息。所以,

① [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第3页,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27、197页及以下,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③④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859—875,544—563页。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9册,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⑥ “五四”以来,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古典文本(即以西解中)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根本不是哲学,而是“哲学史”,也就属于历史研究。而整个现代古典学(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等)都是历史研究(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第255—25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沦为验证理论的历史学的价值是很低的。

关于这里的讨论,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例子主要来自中国的历史研究,但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现代科学背景下的普遍性问题,并且西方比我们更早地遭遇了这个问题,所以,这里的讨论是一般性的。而中西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用自己文化中的史料来验证自己文化中的现成理论,而中国则是经常用自己文化中的史料去验证外来文化的现成理论。第二,现代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也会大量记录数据,整理文献,看起来也是历史研究,但实际上,此类研究跟这里讨论的历史研究几乎完全不同。此类研究没有预先设定一种现成理论,让数据或史料去验证该理论。此类研究预设的不是理论,而是问题,试图在特定问题的指引下,从数据中发现规律。这种研究,完全可能生产出新的有效知识,发现新的有效理论,因而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称为问题式文献/历史研究(即问题之下的文献研究或历史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问题为导向、以发现理论为目的的真正历史研究已主要不在历史学科(历史系)中,而在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的研究中。问题研究,为历史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基本方向。

#### 四、问题研究:历史研究的出路

历史研究若要摆脱验证理论、沦为理论注脚的困境,唯一可能的出路是:把历史放在问题之下,进行问题研究。

根据人类生存活动的“问题+方法+效用”这一基本结构,在问题、方法与效用三者之间,只有先确立问题,才能确立方法,继而才有方法的有效性。人类生存活动首先面对的是问题,是问题统率方法及其效用,而非相反,方法及其效用都只有置于问题之下才能服务于生存目的,所以,这里特别强调问题式历史研究。问题式历史研究的直接效用之一,就在于它可以把文献史贯串为问题史。在时间角度,人类面对的问题及采用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老问题、新问题,老方法、新方法。<sup>①</sup>这意味着,有一些老问题是许多代人都要面对的,而人们一直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生产了许多文献。这些文献,如果不在问题视域之下审视,则会显得非常凌乱,无章可循,犹如未被丝线串起来的

珍珠;而沿着问题,这些文献就会被组织起来,成为一条线,呈现出脉络。问题贯穿于文献,犹如丝线贯穿珍珠;以问题理解文献,则如提丝线而起珍珠,亦即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如司马光所言“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就是要使文献有章可循)。

在问题式研究范式下,史料(或文献)就是数据(含样本)。此时的史料,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是完全同质的,都是经验数据,都没有预设现成理论,数据内部蕴含的规律性信息都需要在问题之下去发现和建构。二者的唯一差别在于:在时间上,经济学等面对的数据通常是当前的数据(但也不一定),而历史研究的数据通常则是更早以前的(什么样的数据算是历史材料,在时间上可以作一规定,如五十年前,或某个重大事件之前)。其实,经济学等学科也经常利用史料,如经济史研究。

问题式历史研究可分为两种模式:其一,考察前人对某个问题解决到了何种程度。其二,在特定问题之下,利用历史材料解决问题,进行理论建构。而关于文献的角色,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征是:文献史乃是问题史。问题史中的文献显然与作为验证理论的案例和注脚的文献迥乎不同。

第一种模式的价值在于:当文献史成为问题史,我们就可以很针对地理解问题的解决史,考察前人分别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法,各自方法的有效性如何,后人对前人有哪些推进,该问题解决到了何种程度,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有待解决。作为问题史的文献史虽然未必能提供新的有效解决方法,但可以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关于问题解决的脉络,且更容易通过历史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发现前人的各种解决方法及其有效性程度差异,从中获得启发,减少研究者的重复劳动,从而推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此种模式还可以帮助我们辨明,我们能否提出更好的方法;若提出了新方法,新方法又是不是对前人的推进。

第二种模式则是把文献当作数据,作为理论建构的材料。这种研究中的文献,不论其时间跨度如何,都完全服从于问题的解决。在问题之下,文献

<sup>①</sup> 邓曦泽:《问题、方法与经典——〈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二),见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附录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亦载《哲学动态》,2010(6)。

呈现出其可能蕴涵的规律性信息,成为理论建构的原材料之一。这时的文献史,更是被问题激活和贯穿,极具问题史特色。而这种历史研究是能生产有效知识和发现有效理论的,其价值自是显而易见。此种模式,可以概括为“问题+历史材料+科学方法+一般结论”范式,并进一步简略为“历史材料+科学方法”范式。

但是,当把文献史转化为问题史后,有一新的问题就会提出来,此即研究方法问题。问题式历史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研究方法要求,而提出这一要求的学术背景乃是:现代科学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且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趋势越来越强,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必须加强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唯其如此,研究者才能理解问题史的演进,并进行有效的整理。布罗代尔说,历史学“必须吸收比较新的各种社会科学在取之不尽的人类活动领域里的一切发现。这是一项艰难但紧迫的任务。只要历史学坚定地走上这条道路,就会对理解当今世界大有裨益”;他还谈到打破专业界限,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对话,并要面对现在。<sup>①</sup>布罗代尔的说法没错,但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历史学要

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在第一种模式中,历史研究应大力发展专题史,研究一个专门问题的演进。而要知道某一专门问题的演进,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背景,否则无力胜任。在第二种模式中,若要利用文献解决一个问题,且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对相关问题必须具有相当深厚的专业背景。

当然,若要研究者掌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会导致新范式下历史研究的困难和成本大大增加,但是,收益的增加将远远超过成本。唯有研究者掌握相当程度的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历史研究才可能在其所擅长的经验归纳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重新接近现代科学。当然,即便如此,历史学依然不能重振往日的荣光,重新成为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焕发生产有效知识、发现有效理论的生命力。

〔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x201101)、四川大学国家“985工程”“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资助〕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224,231—234页。

## To Discover Theory or to Testify Theory

——The Plight and Outle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 Science

Deng Xize

**Abstract:** The most significant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is knowledge production. It means, the more effective knowledge a subject can produce, the more important and prosperous it is. In ancient times, there are primarily two historical methods: one is recording facts in large amount to constitute abundant samples; the other is induction, i. e., making a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samples and finding out some regular patterns. This implies that as a way of producing knowledge through inducting experience, history has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theory effectively, and in ancient times it act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wa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was quite prosperous as well. However, owing to the much stronger ability of knowledge yielding, modern science outshines traditional subjects, such a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s a result, they fade out. History, however, descends to a case or footnote to verify the existing theory, and becomes increasingly less valuable. But if history is modified to be problematic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y of literature is mended to be the history of problems, and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s added, history will newly approaching modern science. And then, history is able to arouse the vitality of producing knowledge and discovering theory, though it cannot become the main fashion of producing knowledge again.

**Key words:** historical research, discover, testify, theory, modern science